

挺进，向雪域高原

■曹明敏 程宇一



我军进藏部队行经草原

1950年初，十八军奉命进军西藏，3万名将士从四川出发，挺进雪域高原，于1951年5月和平解放西藏。至此，中国大陆全部解放。十八军克服高原高寒、缺氧缺粮等因素影响，充分发挥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生产队和工程队作用，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同帝国主义、藏独分裂势力坚决斗争，为解放和建设西藏、捍卫国家领土主权作出了重要贡献。

刻不容缓

新中国成立后，西藏地方上层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紧锣密鼓地策划“西藏独立”活动，藏区形势愈发复杂严峻。在西藏噶厦政府武装驱逐国民党驻藏办事处所有人员后，达赖喇嘛和摄政达扎开始组织亲善代表团赴美、英、印等国寻求支持，暗地里酝酿在当年年底的联合国大会上申请西藏独立。帝国主义从自身利益出发，与藏独势力遥相呼应，其扶持西藏地方政府之心可谓人尽皆知。美还公开为西藏反动势力撑腰，称“西藏将派出亲善代表团赴美、英、印、尼和北京表

示独立”。面对赤裸裸的挑衅，党中央认为，西藏问题事关重大，解决西藏问题事不宜迟。当时正在苏联访问的毛主席多次急电中央、西北局和西南局，反复讨论研究。西藏问题一被提上日程，便显得刻不容缓。

重任在肩

起初，毛主席考虑到班禅及其随从都在青海，且西南方面尚未完全解放，提议由西北局争取在1950年秋冬完成西藏解放。时任西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在深入调研后报告，由西北入藏的道路每年只有5月中旬至9月中旬可以通行，其余8个月都是大雪封路，再加上政治限制、屯兵屯粮、修筑道路等因素，入藏准备保守需要2年时间。于是，进军西藏的任务转由西南局筹划。西南局在第二野战军3个兵团9个军中权衡。邓小平认为，西藏是少数民族地区，各个领域都有特殊性，解决西藏问题应多靠政治。综合考虑进军西藏的军事、政治、作战和补给等问题，具有开辟新区经验和卓越指挥才能的十八军军长张国华跃入刘邓眼帘。主将选定后，接下来便是挑选进藏部队。邓小平最初决定在第二野战军所有部队中挑选3个主力师，组成1个3万人的野战军入藏。但张国华考虑到原部有相当数量的老红军，抗战干部多、素质好，并且便于指挥，提出率老部队十八军入藏。

1950年1月24日，西藏工作委员会成立，进军西藏、经营西藏的任务历史性

地落在了十八军将士的肩上。

思想转变

一纸命令，原定驻守富庶川南的十八军官兵面临抉择考验。为确保顺利进军西藏，十八军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一是凝聚人心的广泛动员。消息刚传到十八军时，面对胜利果实和再次征战、安全稳定和生死难测、亲人团聚和骨肉分离的巨大反差，十八军领导在广大指战员中进行思想动员，“干部要起带头作用，所有的人思想都要通，要高高兴兴地去西藏”。他们紧紧抓住将士崇尚荣誉的诉求，决定“逃兵一律不准去西藏，就地转退地方”，这一举措对于稳定军心、凝聚人心发挥了巨大作用。二是卓有成效的思想教育。面对部队思想情绪，十八军积极开展爱国主义、形势任务等教育，重点揭露帝国主义和藏独势力分离西藏的阴谋，回顾十八军在革命战争时期的艰难历程和光辉战绩，阐明进军西藏、解放人民的重大意义。军文工团还创作进军西藏歌曲，激励官兵革命荣誉感、保卫边疆自豪感和维护祖国统一的使命感。三是以上率下的决心意志。最有说服力的思想工作就是以身作则。据原十八军司令部侦察科参谋王贵回忆，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把3岁的小女儿带上进军西藏动员大会主席台，向全军将士现身说法，坚定表示一家三口一起进军西藏，同甘共苦、患难与共。遗憾的是，张国华的小女儿“难难”在进藏途中夭折，成为十八军进藏年龄最小的“革命烈

士”。军长的模范带头作用极大鼓舞了士气，激发全体指战员血性胆气，坚定了进军西藏的决心，完成了十八军将士从“川南安家”到“进军西藏”的思想转变。

站稳脚跟

邓小平指出“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十八军在统战、文化、后勤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先遣部队到达藏区后，通过谈心等方式，向藏族上层人士宣传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并免费为藏民治病，尊重藏族风俗习惯，不进寺庙、不动经幡，尽力消除历史遗留的藏汉民族隔阂，有力促进民族团结。从四川到拉萨，部队的给养一直是难题。刚到甘孜，部队便进入“粮荒”状态，有的连队甚至挖野菜、抓地鼠、捉麻雀果腹。面对西藏反动上层妄想困死、饿跑我军的企图，十八军领导决定部队立即投入生产，开展劳动竞赛，生产粮食，解决了部队的吃饭问题。

修筑公路是在西藏站稳脚跟的关键。在高原高寒的世界屋脊修路，挑战前所未有。十八军将士和支援藏族群众以惊人的毅力，在零下30多度的严寒中烧挖冻土，打钎炸石，突破怒江天险，劈开然乌沟石峡，硬是打通了康藏、青藏两条公路，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链接历史

百战奇略

《百战奇略》风战篇原文为：凡与敌战，若遇风顺，致势而击之；若遇风逆，出不意而捣之，则无有不胜。法（《吴子·治兵第三》）曰：“风顺致呼而随之，风逆坚阵以待之。”

风战篇认为，大凡对敌作战，若遇顺风天气，就利用风势进攻敌人；若遇逆风天气，也可出其不意去打击他们，这样就能无往不胜。恰如兵法所说：“风天作战，如果我方顺风，就乘着风势进攻敌人；如果我方逆风，就应坚守阵地，防止敌人来袭。”

风顺致呼而随之，风逆坚阵以待之

阳城之战与陆房突围

■周家俊 邓威

原典

五代后晋开运二年（公元945年），后晋军被契丹军围困于阳城（今河北保定西南）。契丹军依托兵力优势，借助“东北风大起”之机，顺风放火并扬起沙尘，向后晋军发动猛烈进攻。后晋军主帅北面行营都招讨使杜重威等人主张防守，“俟风回与战”；但马步都监李守贞等则主张利用敌方“敌谓我不能逆风战”的心理，攻其不备。随后，主战的符彦卿等将率精锐骑兵发起突然袭击，大败契丹军，解除了阳城之围。

1939年5月初，转战山东的我八路军第115师主力部队及地方党政机关3000余人，被日军5000余人及伪军3000余人围困于纵横不到10公里的陆房山区（在今山东肥城境内）。我军顶着敌方猛烈炮火，利用夜暗隐蔽突围，以伤亡200余人的代价取得了毙伤敌方1300余人的战绩，极大鼓舞全民抗日信心，一举打开了泰（山）西地区的抗日局面。

计谋分析

顺势而为。风战篇旨在强调顺应形势、借机而动的重要性。顺势而为，历来是兵家铁律。就后晋军与契丹军而言，双方都积极利用风向，以求战胜。进攻方的契丹军乘风纵火扬尘，而作为防御一方的后晋军在突围过程中，也派出骑兵绕至契丹军背后，顺风发起袭击，冲破契丹军的包围，并追击败逃的契丹军。

巧借天候、地形、时机等有利之势来组织作战行动，是取得作战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为突破敌方包围，我军115师师长陈光果断命令部队占领陆房村周边制高点，依托地利连续10余次击退敌人进攻。战至5月11日黄昏，我军发现日军因不敢夜战而主动收缩兵力。我军随即抓住这一时机，快速收拢部队，进行政治动员，宣布突围纪律，埋藏重要物资并安置伤员，分路隐蔽实施突围。

因情制宜。运用风战之法，必须紧贴实际情况，灵活调整策略，实现顺势而为与逆势而动的有机结合。战势的发展、战机的出现不可能一直顺遂如意，指挥活动与作战行动也就无法持续顺势而为，必然要面对逆势挑战。后晋军因粮草与水源补给被契丹军切断，加之逆风受困，大量士兵和马匹渴死、饿死。此时后晋军内部在立即反攻还是坚守防御的问题上，产生了明显分歧。主帅杜重威等人主张防守，等待风向转变之后再行出战，而马步都监李守贞等人则坚决主张出击，避免因军中饥渴问题加重而坐以待毙。幸而李守贞等人成功说服主帅即刻派兵反击，才终于大败敌军，解除阳城之围。

“明者因时而变，智者随事而制”，优秀的指挥员既要善于顺势而为，更要敢于逆势而动。顺势是等不来的，

尤其是在面临逆势之时，消极等待更容易陷入被动境地。唯有主动作为，才能化解逆势、掌握主动。115师在11日入夜之时，所剩力量及弹药已无几，无法应对日军次日进攻。同时，日军为防止我军利用夜暗突围，在陆房周边各制高点 and 路口燃起火光照明，并以炮火持续打击我方各阻击阵地。为避免弹尽粮绝、遭敌围歼的不利后果，我军即刻主动展开突围，仅用4个多小时便完成一切突围准备，于夜间22时许开始突围，12日拂晓安全地跳出了日军的“铁壁合围”。

出其不意。成功运用风战之法，关键是要力求隐蔽突然，做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后晋军能够在敌方猛攻和逆风之势下成功突围，关键是抓住了“敌谓我不能逆风以战”的麻痹心理，乘契丹军自恃占有顺风之势而放松警惕的空隙，以精锐骑兵突袭击退敌方攻势，在逆风之势下创造以寡敌众、以少胜多的成功战例。

在这一点上，陆房突围与阳城之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陆房村向外突围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条是东南方向的山间大路，地形复杂且利于隐蔽，即使被敌发现尚有强行突围的可能；另一条是西南方向的山顶小路，穿过日军营地，四周高地也被日军控制，并被日军燃起的火堆照得透亮，连日军巡逻兵的钢盔和刺刀都映照得清晰可见。在选择突围路线时，多数人建议走大路，但陈光为求出其不意，特意规定“避开大路、专走小路，不进村庄、绕道穿行”。日军无论如何都想不到，我军会从其营地中间通行。“敌人燃起的火堆近在身旁，敌军喊话的声音清晰可闻”，我115师主力部队及地方党政机关3000余人却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成功突围。



阳城之战大队民警参与绘制的连环画《陆房突围》

微历史

沙漠夜行衣

海湾战争时期，伊拉克军队从苏联秘密购置一批夜视仪，使美军在夜战中陷入被动。美军因此研发一种沙漠夜间迷彩服，以减少士兵在夜战中的伤亡。

当时苏联电子工业相对落后，其制造的感光芯片像素点密度偏低，目镜中亮点之间“拼缝”的处理简单。美军正是利用了苏制夜视仪的这一特点，在原迷彩服上印染“深色网格”，让夜视仪像素点之间的“拼缝”增大，使得夜视效果大打折扣。为避免在夜视仪中形成完整人体轮廓，美军还在迷彩服上印染直径1英寸至3英寸的深色不规则斑块。这种迷彩对肉眼伪装性差，却能有效干扰苏制夜视仪的夜间成像。

海湾战争结束后，这种专门针对苏制夜视仪的“沙漠夜行衣”很快销声匿迹。不过，针对光电器材进行伪装的技术从此日益受到重视。

二战时期的超级武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突破马奇诺防线，希特勒曾下令制造一门有史以来最大的火炮——古斯塔夫巨炮。这门巨炮口径800毫米，长42米、宽7米、高11.3米，一枚炮弹重量可达7吨，能摧毁37公里外的目标，堪称当时的“超级武器”。

1942年4月，这门巨炮在首战中就创下辉煌战绩，仅用一枚穿甲弹就摧毁苏联隐藏在地下30米深的军火库。

因炮身太重且体积过于庞大，古斯塔夫巨炮发射一枚炮弹需上百人进行操作。不仅如此，在运输这门巨炮时，德军甚至要出动上千人，才能让它进入战位，这让古斯塔夫巨炮一度成为德军后勤部门的噩梦。

希特勒曾梦想依靠古斯塔夫巨炮创造战争奇迹，但最终未能如愿。战后，这门巨炮被美军缴获，因无法运输，只能将其原地熔化。

（杨远超 曹胜杰）

六连岭上现彩云

琼崖革命武装斗争“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光辉岁月

■林业茂 谢引



六连岭烈士陵园

六连岭坐落于海南省万宁市北郊，因六峰相连而得名，亦是古代万州八景之一。在琼崖（海南岛旧称）新民主主义革命浪潮中，六连岭革命根据地是我党领导人民群众在海南岛最早建立、坚持对敌斗争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根据地之一。从1927年创建到1950年海南岛解放，六连岭革命根据地创造了“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奇迹。

1927年4月22日，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阴影下，国民党反动派以“清党”为名，悍然发动琼崖“四二二”反革命事变，大肆搜捕、杀害共产党员与进步人士。据统计，“四二二”反革命事变期间，全岛共有2000余人被捕，500余人被害，琼崖党组织和革命事业蒙受巨大损失。为反抗敌人对共产党员的大肆屠杀、保存琼崖革命火种，中共琼崖地委、万宁县党部、县委会决定以开展“野外演习”为名，于4月23

日晚率领部分人员与农训所200余名学员撤离县城，星夜奔赴县城以北30公里外的六连岭山脉驻营，从而完成了革命力量从城市到农村的战略转移，也为创建六连岭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5月12日，为顺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在琼崖地委书记王文明主持下，六连岭地区的农训所学员被统一整编，组建成立一支农民武装大队，下辖两个中队。这也是大革命失败后，琼崖共产党最早创立的一支农民武装力量。

然而，在农民武装大队成立当日，国民党发动了“围剿”，进而发生了一场遭遇战。12日上午，国民党琼崖警备司令黄镇球出动少量兵力，并纠集当地民团，对六连岭地区的村落进行扫荡。获知情报后，中共万宁县部委、农训所相关负责人同志在六连岭寮村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先避开敌人

锋芒，将农民武装力量隐蔽到山上，暗中监视黄镇球部行动，再寻机开敌。16时左右，以逸待劳的农民武装大队未发现敌人有进一步行动，误以为黄镇球部有撤退，于是派先头队伍下山补给。在下岭回军寮村途中，他们突然遭遇黄镇球部人马。危急关头，大队长陈永芹临危不乱，带领一支枪支配备较好的小队，利用六连岭山脉复杂地形与敌周旋，奋力击退来犯之敌。军寮村战斗虽歼敌数量不多，却在琼崖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揭开了党在琼崖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序幕。

六连岭革命根据地创立后，琼崖革命火种愈燃愈旺，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1928年起，国民党反动派对根据地开展一轮又一轮的“清剿”，修堡垒、烧山林、毁房屋，企图彻底切断六连岭红军与当地群众的联系，熄灭革命火种。没有吃、没有穿，根据地的指战员们只能挖野菜、住石洞。因医疗物资极度匮乏，大量伤病员牺牲。最艰难的日子里，根据地仅剩27人。但就是这仅存的27位同志，整编成一个红军排，继续传播革命火种。

抗日战争时期，琼崖东区军政委员会在六连岭成立，统一领导琼东地区乐会、陵水、崖县、保亭4县抗日进步力量，屡次粉碎日军的“蚕食”计划。解放战争时期，六连岭军民采用游击战策略，大量消灭国民党有生力量，并于1950年4月策应解放军渡海登岛作战大军顺利解放万宁县。对六连岭根据地海南解放事业作出的贡献，朱德总司令曾赋诗道：“六连岭上现彩云，竖起红旗革命军。二十余年游击战，海南人民树功勋。”